

郑瑛 编

# 新时期短篇小说探微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 新时期短篇小说探微

郝 璐 编

\*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外花园村)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保定市振兴包装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印张: 8.62 字数: 228千字

1988年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7—81014—147—3/G·142

统一书号: 7427·352

定价: 2.35元

## 序 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新时期短篇小说是新时期文学中一个最为突出的部分，它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必须有比较的观念，把它与过去的27年相比，以便在更深层次上看到它对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是我国革命文学的一贯传统。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革命的现实主义就已成为革命文学的主流，尤其是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我们的作家更加自觉地遵循革命现实主义原则，从生活出发，真实地、历史地反映民主革命的伟大业绩。在他们的作品里，描写了前所未有的新的主题，新的人物，并且运用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语言。建国之后的短篇小说创作，继承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沿着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也取得了不可低估的成就。但是，纵观“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27年的小说创作情况，我们不能不看到革命现实主义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笔直。它曾经受到“左”倾思潮的干扰，有时被歪曲，有时虽有表现但却并不充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则被彻底否定了。这段历史教训，我们很有必要加以认识和总结，把它作为前车之鉴。

1949至1966年这十七年间，以赵树理、周立波、李准、茹志鹃、马烽、王汶石、王愿坚、峻青等人为代表，创作了丰富多样的作品，把新中国短篇小说园地铺成斑斓的花坛。《登记》、《山那边人家》、《不能走那条路》、《百合花》、《我的第一个上级》、《风雪之夜》、《党费》、《黎明的河边》等，成为我国当代文学史上众口称赞的优秀篇章。他们的作品，以反映工农兵

为建设新中国而进行的火热斗争和建国后人民生活巨大变化为主题，遵循着革命现实主义原则，在这些作品中真实生动地塑造了一系列鲜明活泼的人物形象。但是，在我们承认这些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它们的现实主义精神还未达到充分的程度。一般来说，当时的短篇小说从内容上看无非两种题材，一是历史题材，如《黎明的河边》、《党费》、《百合花》等；另一种是现实题材，如《登记》、《山那面人家》、《我的第一个上级》等。两种作品的共同特点，都是作家依照所谓的“肯定的现实主义”创作的。“肯定的现实主义”要求作家只是正面歌颂描写的对象，除表现敌我矛盾斗争之外，不大涉及人民内部矛盾和冲突，因此，一般作品或多或少带有“无冲突论”痕迹，反映的现实矛盾是比较肤浅的。同时，由于文学的政治功能被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过分地要求作品为每一时期的中心政治运动服务，使得作家们创作的着眼点不是从生活真实出发，而是根据政策需要去搜集生活。如以赵树理同志为首的山西派的农村题材作品，大多数都是为解决农村政策贯彻中遇到的问题而创作的。这些作品表现了相当高的政策水平，但是如何达到高度的政治性与完美的艺术性相统一？现在看来不能不说还存在着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尤其是5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政治上的反“右”斗争，文艺政策进一步走向“左”倾的道路。当时文艺领导机关甚至提出文艺工作者应当“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等紧密配合中心政治运动的要求，还提出“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作品”一类行政命令式的干涉，并在创作题材上划定什么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种种不可逾越的禁区。这种“左”的文艺政策，不仅无助于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而且挫伤了作家的积极性，削弱了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短篇小说创作相当普遍地出现了以抽象的政治说教代替具体的形象的描绘。概念化、公式化倾向严重。革命现实主义要求革命的政治倾向性应当隐蔽在艺术的形象之中，倾向性越隐蔽，则思想性越深刻，这是艺术规

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表示不大喜欢席勒而比较欣赏莎士比亚，道理就在于此。席勒诚然是位了不起的诗人和剧作家，但他的作品缺乏莎氏的形象，较多的是给人以抽象乏味的说教。50年代中后期的作品，虽然也不乏优秀之作，但相当数量的作品是直露的，是图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宣传品，由于缺乏艺术性，所以思想性也就谈不上深刻。

1966年，文学的双脚踏进了“文化大革命”的泥潭。林彪、江青篡党夺权，也不放过对文艺工作的控制。他们提出什么“根本任务论”和“三突出创作原则”，从唯心主义的经验哲学观和个人英雄主义世界观出发，彻底地否定了革命现实主义。在他们的伪理论指导下出笼的所谓文学作品，诸如《一篇揭露矛盾的报告》、《初春的早晨》和《金钟长鸣》等，完全是歪曲现实的拙劣之作。它们是按照“从路线出发”和“主题先行”的反现实主义方法编造出来的，是为“四人帮”反革命政治服务的“阴谋文艺”。“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是革命现实主义备受摧残的最黑暗阶段。

如果我们把十七年短篇小说的创作原则概括为有限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化大革命”十年为反现实主义的话，那么，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进入新时期以来的短篇小说的创作原则则可以概括为比较充分的发展了的革命现实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清算了“四人帮”的极“左”思潮并提出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新经济政策，使我国开始跨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兴旺发达的新时期。1979年全国四次文代会召开，邓小平同志总结以往文艺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精辟地指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从三十年来文艺发展的历史中，分析正反方面的经验，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根据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荒谬做法，破坏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扼杀了文艺生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艺术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艺术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

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邓小平小文选》185页）邓小平同志关于领导方式改变的这些深刻论述，为新时期文学创作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在这种新形势下，文艺创作领域也充溢着春天的气息，作家思想解放，创作积极性大为高涨，短篇小说创作不仅数量空前，而且质量也较过去有很大提高，达到了繁华似锦的蓬勃发展局面。其具体表现为：

一、突破题材禁区，坚持从生活出发。新时期短篇小说创作是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路线出发”的。在题材方面，作家最先突破的是大胆揭示“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现实，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戒律，把“文化大革命”的罪恶赤裸裸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发端的“伤痕文学”，愤怒控诉了“四人帮”假借党的名义给中华民族、给我们的下一代造成的精神扭曲，为文学正确处理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的关系，创造了可贵的经验。以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刘真的《黑旗》和张贤亮的《灵与肉》等为代表的“反思文学”，从审视历史的角度，揭露了我们建国之后“左”倾思想发展的脉络，为寻找“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形成的原因而做出了贡献。人们在总结历史教训之后，并非只停留在对创伤的抚摸和不幸岁月的回顾之中，而是放眼未来，把希望寄托在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上。国家经历了30多年风风雨雨，终于在党中央领导下走上恢复和发展的大道。全面改革，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的光荣使命。在改革中，人们的矛盾和斗争、成功和失败、痛苦与欢乐，这一切都给文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因此，反映各个领域改革题材的短篇小说、“改革文学”如雨后春笋，成了中国文坛令人瞩目的创作热潮。在反映改革题材的一长串小说名单中，我们首先应当提及的是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等讴歌“开拓者家族”的系列小说，一扫以往所谓“车间文学”的积弊，从单纯地描述技术改革或生产劳动的过程转向对改革家命运

的描写，体现了“文学是人学”的本质。在他的作品里，乔厂长、金厂长等的个人命运是与工厂改革成败紧紧拴在一起的。乔光朴和金凤池在改革中带有悲壮色彩的拼搏，不仅涉及到对十年动乱造成的弊端的揭露，还更深层次地挖掘了我国社会现实中仍然存在着带有严重封建色彩的官僚主义。这些作品既能以乔光朴这样的新人形象鼓舞千百万人去奋斗，又能启发人们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艰难和复杂。以改革题材创作的优秀短篇小说，除蒋子龙的“开拓者家族”的系列小说之外，还有柯云路的《三千万》，张一弓的《黑娃照相》，李准的《大年初一》，高晓声的《陈奂生转业》，何士光的《乡场上》，铁凝的《哦！香雪》，王蒙的《说客盈门》等等。这些作品无论是内容的深刻性、反映生活的广阔性和艺术的独创性，都是十七年里类似题材的短篇所不能企及的。

军事题材的短篇小说也有发展和突破。军事小说在建国后一直是比较繁荣的。王愿坚、峻青、茹志鹃、肖平等人的军事题材短篇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尽管军事小说在过去十七年中取得了可喜成就，但是，某些“左”倾教条主义理论难免也给它套上种种枷锁，如不能写英雄人物的缺点，不能揭示军队内部的阴暗面等等，这些都是不成文的戒律。新时期的军事题材的短篇小说对此有大胆的突破。徐怀中的《西线无战事》，李斌奎的《天山深处的大兵》，张廷竹的《他在拂晓前死去》等等，一方面继承了我国当代军事小说传统，在作品里歌颂了我军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同是他们又给军事小说注入了新的血液。作家们沿着革命现实主义道路，注重对当代军人精神世界的纵深开掘，不仅写了英雄的壮烈牺牲，还敢于揭示他们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把英雄人物成长过程的曲折与整个社会政治风云、道德观念的变化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样，使得军事小说冲破了狭窄天地，能够从更广阔的世界再现80年代当代军人的风貌。

新时期短篇小说仅从创作题材扩展这一方面的成就来看，已经摆脱了僵化的窠臼，适应了新时代的历史要求，较之十七年有了飞跃的进步。

二、思想内容的进一步深化。现实主义要求作家按照生活的实际面目来描写生活，但是生活的实际面目并不只是表面的，它还有更深刻的内在含义，所以，现实主义作家应当不仅描写生活的表面真实，更应该写出生活内在本质的真实。过去，短篇小说在宣传党的政策、塑造模范先进人物形象、歌颂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诸方面，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社会教育效果是明显的。但是，由于一贯强调创作的社会整体意识，要求作家表现社会的“大我”，从而对作品反映人物个人命运和表现作家较强的主体意识的作品，则采取一种批判态度。这一来，不少作品虽然思想性很强，但却缺乏形象的感染力量，或者在作品里集体意识反映有余，而个性特点则表现不足。或者也可以说过去的一些作品，较多的是反映了生活的表面真实，缺乏对生活内在真实的挖掘。新时期以来，短篇小说遵循革命现实主义原则，向生活纵深推进。不少作家把握了文学是“人学”这一艺术规律，大胆地在“人”字上做文章，突出写人的命运遭际，把内容深化到人的本体意识，并揭示其深广的社会意义，表现了人性、人情、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过去多年被排斥在文学门外的敏感问题。过去曾有人把它视为“修正主义”的同义语，一提人道主义就把它与资产阶级人性论紧紧拴结在一起，似乎无产阶级与人道主义誓不两立，拱手把人道主义奉送给资产阶级，这显然是一种对人道主义的曲解。

人道主义思想被新时期文学大胆接受有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过程。粉碎“四人帮”最初几年，文学的主题是着重从政治上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进行反思。刘心武的《班主任》从批判“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无用论”的独特角度，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这是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呼唤。如果我们把这篇小

说仅仅看成是表现人道主义的最初阶段的话，那么到了湛容的《人到中年》以及此后的一系列反思作品，则把呼唤人性复归的这一最初阶段迅速推向统一人们的义务和权利，在更深层次上挖掘人的存在的真正价值的一个新阶段。这些作品向读者揭示了这样一种思考：人对社会不仅有应尽的义务，同时社会也应尊重和关注每个人的利益，让他们获得自己应该得到的一切。到了张洁发表《爱，是不能忘记的》这一类作品之后，人道主义的思想又向更高层次发展，提出了人与人之间应当获得精神上的理解，从而把对人的关心和尊重推向每一个个体的内心世界。新时期短篇小说对于“人”的揭示，不仅升华到人道主义思想高度，而且比较彻底地打破了以往那种用善与恶，勇敢与懦弱，公德与自私等等简单的归类法给每个人贴上标签的模式。

总之，新时期短篇小说恢复了“文学是‘人学’”的本来面目，作品里的人物不再是干巴巴抽象的阶级共性的代表，而是活生生、有血有肉、有个人独特命运的文学形象，这不能不说是革命现实主义发展的又一表现。

对国民意识和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也是新时期短篇小说思想内容进一步深化的重要方面。1984年全国首次掀起了所谓“寻根文学”的热潮，推出了一批“寻根小说”和“文化小说”，这是作家们在现实的土壤上向历史纵深开掘的尝试。近年来如贾平凹、韩少功、阿城、郑万隆等人，他们创作了为数可观的“寻根小说”和“文化小说”。在这些作品里，作者一方面批判了我们民族传统心理中的因循守旧、麻木不仁等劣根性，同时他们更为注意发掘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张扬中国人民在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以及审美情趣等方面受古代灿烂文化的熏陶。这批所谓的“寻根小说”和“文化小说”，虽然避开了现实描写，但它的现实意义却不可忽视。80年代是我们向着新潮流奔涌突进的大转变、大更替的年代，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关键时刻，我们的文学能够审视历史，自省民族意识的弱点，发扬光大民族文化的精

华，这对于促进民族意识的自觉，将会是大有助益的。

三、新时期小说创作流向出现了多样化势头。这个问题目前正引起众人的注意。流向既不是流派也不是倾向，而是从艺术个性方面表现的发展趋势。在粉碎“四人帮”的最初阶段，小说创作即使是些不成熟的较粗糙的作品，也能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主要靠的是作品的真实性的力量。因为读者对过去那些虚伪的作品太厌倦了，现在出现了敢说真话的小说，自然感到格外新鲜，而不顾及其内容深度艺术水平如何了。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读者又不满足描述昔日岁月悲欢离合的故事，而要求作品有更新的内涵、启迪和艺术感染力了。作家们适应这一要求，在认识生活和反映生活方面更自觉地发挥了艺术创作的想象力，产生了各具特色的作品，犹如同一原料，在不同厨师炒勺之下做出各不相同的佳肴。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在不同作家的具有艺术创作想象力的笔墨之下，可写出在气氛创造、格调、意境、形式各方面却有着很显著的区别的佳作，这就是最近几年来小说创作的流向。流向是着重从艺术形式方面而言的，也可被看成是作家不同的个性、风格和手法。近年来小说创作流向趋于多样化，但它们都建筑在革命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可以说是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在形式上的多面发展。

短篇小说创作的流向，可以分为四大类型：坚持贴近现实的写实派，及时反映社会问题的“问题小说”；不大注重贴近现实，往往与现实生活保持一定距离，力求表现地方特色的“乡土小说”；吸收西方某些现代派表现手法的“现代小说”；具有黄土高原和西北边塞地区风情的“西部文学”等。

“问题小说”着眼于写社会问题。一般说来，凡小说大致离不开社会问题，文艺作品是人在社会中生活的反映，人是社会的，因而文学的社会性是避免不了的。尤其是社会责任感较强的作家，他会随时关注社会现象，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但是我们这里所指的“问题小说”并不是指一般文艺作品的社会性，而是专指一些比较贴近现实，能以最迅速的创作追踪时

代的脉搏，反映社会心态的作品。王蒙被人们誉为时代心灵的追踪者，他的《高原的风》比较他早些时候的《春之声》等，更注意通过对新时期物质与精神生活变化的描写，发掘在新形势下人的心灵运动的轨迹。张洁的短篇，侧重于对社会道德观念的揭示，但《尾灯》对十一级干部邓元发旧意识的揭露，与她过去的《谁生活得更美好》等短篇对旧意识的揭露相比，已经超越了一般社会道德的范畴，而深深揭示出一些人灵魂深处封建主义的桎梏，并敏锐地指出这种思想毒瘤与社会改革水火不容的严重趋势。刘心武的纪实小说《5·19长镜头》和《公共汽车咏叹调》的发表，几乎与事件发生同步，及时反映了新时期某些人的社会心态，提出在当前的变革时期，人们需要相互理解才能保持心理平衡这一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张廷竹的《他在拂晓前死去》和徐怀中等人的军事题材小说，对于新时期我军战士的生活风貌作了别开生面的描写，从军人生活的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体社会的某些观念的变化。

上述这些以反映社会问题为主旨的“问题小说”，与过去一些侧重写社会问题的作品明显的区别在于：没有过去常见的把人物作为抽象化分解问题的模式；没有揭示矛盾冲突后的总结式议论；没有概念化雷同化的公式。这些“问题小说”重视了对人的感情、性格、思想、遭遇和命运的描绘，体现了“人学”的本质特征。

“乡土小说”在新时期小说创作园地里也是一支非常活跃的力量。刘绍棠是新时期唯一的正式打出“乡土文学”旗帜的作家。其余如汪曾祺、林斤澜、陆文夫、贾平凹、古华、铁凝以及众多的“京味”小说作家，他们虽然从不标榜自己的作品是“乡土文学”，但他们的作品都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所谓乡土气息，有人理解就是有地方语言特点，认为凡具有地方语言特点的就是“乡土文学”，这无疑是个片面的。诚然“乡土文学”应当有地方语言特色，但不仅如此，还必须具有地方风情和地域心理等

等方面的特征。具有乡土特色的文学总是和对一定地域社会生活的艺术描写紧紧联系在一起。刘绍棠的乡土小说，主要描写的是京东运河岸边风土人情，他的短篇小说《蛾眉》、《说书人》、《地母》、《含羞草》等，生动地再现了京东运河两岸的历史、地理、习俗、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加上他在作品里使用的是纯熟的京东方言，和常常采用冀东民间艺术的表现手法，使他的作品乡土气息很浓。汪曾祺的小说被誉为苏北高邮地区的风俗画，他的《受戒》、《大淦纪事》、《故乡人》等，充满着苏北水乡的优美风情，不仅写出了那里的河湖港汊，红莲白藕，鱼肥米香的风景美，而且写出了那里悲欢离合命运的人情美。湖南作家古华、孙健忠、叶蔚林等人的乡土小说，把湖南的山川景物，自然风光，写得有色彩，有情调，有韵致，真是情景交融，如诗如画，使富有魅力的南国乡土更显示出秀丽、清新、质朴之美。乡土文学的作者的美学上有他们自己的独特追求，不少作品都是描述往昔故事，与现实生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小说结构上不求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往往再现出如田园诗和农家小景般的恬淡情调；他们不追求现实的壮烈美，而喜欢自然的诗情美。乡土小说中普通人的命运，渗透在风土人情里的悲喜得失，都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正如汪曾祺所说：“小说里写风俗，目的还是写人。不是为写风俗而写风俗，那样就不是小说，而是风俗志了”（《谈谈风俗画》）。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热衷写社会问题的小说家与擅长风俗画的乡土小说家，他们都是在现实主义大道上朝着同一个方向迈进的。

“现代小说”的出现与新时期短篇小说创作的艺术观念发生急剧变化是分不开的。随着对外实行开放政策，西方文化被国内人更大程度地引进和吸收，在文化观念上受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我们国内现代生活的节奏日益加快，要求文艺与之相适应。上述影响表现在小说观念方面的变化，最引人注目的是非传统倾向。非传统倾向主要指小说的非情节化，这与我国古代小

说注重故事结构的传统是逆向发展的。现代小说不讲究故事性，不再把情节作为小说的要素，主张写作者的内心感受，写作者主观意向。传统小说还把人物塑造放在重要位置，现代小说也不追求人物性格塑造，甚至排斥人物典型化的理论，他们力主写出作者内心感受力的反映，即使写人物，也尽量淡化人物的外在描写，刻意追求挖掘人物复杂和丰富的内心活动。这类小说具有明显的现代派意识，因此我们称之为现代小说。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湛容的《减去10岁》，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等，就是这类小说艺术观念的实践。

现代派的作家，还主张小说主题模糊性，鄙弃传统小说要求的具体特定的“典型性”，反对时间规定性，主张发挥作者最大限度的主体意识。这类小说往往给人以主题不确定感，小说表现的思想让读者捉摸不定。对这类小说，我们应该承认它是一种探索，是一种新事物，但并非每一件新事物都是被看成是绝对的真理。每一种创造，每一种试验和探索，都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小说艺术的新观念和创作实验的成败得失，目前定论为时尚早，还需经过一定时间的沉淀，历史自然会给予公正鉴定的。

新时期短篇小说流向中还有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边塞文学。所谓边塞文学，主要是从地域概念上划分的，如北疆的“北大荒文学”，西北地区的“西部文学”，南疆的“深圳特区文学”等等，其中以西部文学影响较大。西部小说，西部电影，西部诗歌都属于西部文学范畴。西部文学这一概念只是近10年来的产物，人们把反映西北地区风土人情的文学作品统统称为西部文学。西部文学表现了我国大西北地理特征、文化特征和人们的社会心理特征，张贤亮的《灵与肉》，陈放的《大漠孤烟》，路遥的《人生》，邵振国的《麦客》都是西部小说的代表作品。这些小说在风格上有其独特之处，一般地说，它们描写西北地区人情风俗具有浓烈的人情味，作品里的人物往往有着大西北粗犷的男子

汉风格，在思想内容方面揭示的道德观念、伦理观念的矛盾冲突，较之其他作品则更为尖锐激烈。正因为这些小说有不同一般的特征，所以在新时期文坛上他们独树一帜，成为一支相当活跃的力量。

新时期短篇小说，空前繁荣，反响巨大。“见一斑而窥全豹”，本书就上述四个走向，精选了10篇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并作了简要的评析。这10篇小说是：王蒙的《高原的风》，张洁的《尾灯》，刘心武的《5·19长镜头》，张廷竹的《他在拂晓前死去》，林斤澜的《李地》，汪曾祺的《受戒》，刘绍棠的《蛾眉》，谌容的《减去十岁》，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邵振国的《麦客》。选篇显然过少，但希望通过这10篇小说的评析，描绘出新时期短篇小说的发展变化，有益于揭示其创作演进的规律的探讨。如果这本书能够引起读者对新时期短篇小说的阅读兴趣以及对上述问题的深入研究，这就是编者最大的快慰和喜悦了。

1987年9月

# 目 录

## 序言

人的心灵轨迹的追踪 ..... ( 1 )

高原的风 王 蒙

道德的审视与良心的判决 ..... ( 23 )

尾灯 张 洁

社会信息的迅速反馈 ..... ( 54 )

5.19长镜头 刘心武

多色彩的英雄形象 ..... ( 77 )

他在拂晓前死去 张廷竹

“怪味小说”的独特审美价值 ..... ( 97 )

李地 林斤洵

——矮凳桥的女镇长

江南水乡的风俗画 ..... ( 145 )

受戒 汪曾祺

京东运河两岸的风土人情 ..... ( 165 )

蛾眉 刘绍棠

瓜棚柳下杂记之一

荒诞的现实感 .....	(179)
减去10岁    谌容	
并非多余者的叹息 .....	(199)
无主题变奏    徐星	
黄土高原的晨曦 .....	(227)
麦客    邵振国	

## 人的心灵轨迹的追踪

王蒙的小说，一贯以关注社会生活、及时反映社会心态为特征。50年代中期，他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轰动文坛，提出在党的首脑机关克服官僚主义这一振聋发聩的主题，为此得咎，之后经历了20多年坎坷生涯。1978年，党给他平了反，使他重登文坛并爆发出更加旺盛的创作热情。新时期以来，不仅作品众多，而且反映的思想内容也更加深刻，读者把他的小说称作是对人的心灵轨迹的追踪。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最初几年，他写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如《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和《风筝飘带》等。它们越过了当时“伤痕文学”对“文革”10年沉痛回忆和创伤的揭露，着重写了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社会转机之际人们的心理状态。这里有新旧交替时的困惑和振奋，也有对自身存在价值的重新发现。新时期五光十色的社会现象在人们心灵中的投影，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心理状态，都在王蒙小说中得到生动的反映。

《高原的风》发表于1985年。这篇小说对人物心理的揭示具有更深刻的意义。社会主义新时期，人们不仅政治地位在变化，经济生活也在迅速的好转。这种变化使人们在思想上产生了新的思考和新的矛盾，这就是《高原的风》所要揭示的问题。

中学教师宋朝义，过去因为有海外关系，政治上受歧视，经济上常年贫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他带来了转机，他成了统一战线对象，当上当地政协、侨联、社联副主席、人大代表、特级教师，一顶顶桂冠戴上头，两套新房分到手，物质生活，政治荣誉，一切如愿，心满意足。但是宋朝义却感到精神上缺了点什么，想起过去虽然穷困潦倒，然而精神上反倒安定。这是一种心理失重的表现，因此儿子说他“烧包”。儿子龙龙和宋朝义的生活观念截然相反，他厌恶一切口号，需要的是摩托、录相机，根